责编：沈辉 E-mail:zydxshenhui@2008.sina.com Tel:010—62806418

◆观 点

# 莫让名人特权击碎政府公信

随着一封公开信的发出，著名导演张艺谋12月1日晚终于作出回应，称与妻子陈婷的确育有两子一女，表示愿意接受调查并依照国家规定接受相应处罚。至此，“张艺谋是否超生”的谜团总算有了一个正式答案，但是，围绕这一事件的种种疑问和反思却远未终结。

回顾“张艺谋超生事件”的前前后后，其间有太多不正常的做法值得关注，有太多不寻常的行为值得深思。从近7个月迟迟不予表态到接受“代理人”而非本人递交材料，从拒绝出示调查结果，仅在官方微博转发张艺谋公开信，到最终“希望张艺谋能按法律法规主动配合”的温柔表态，任民意汹涌、众口嚣嚣，有关方面能躲则躲、能拖则拖，看不到任何应有的积极主动的查处姿态。

超生多年，却始终未予查处，让人难免质疑事件背后的种种关联乃至庇护。孩子从办理准生证、上户口到上学，可谓“关卡重重”，没有相关部门的默许和帮助，当事人何以能“一路绿灯”顺利通关？貌似严格的计生政策，在名人身上却变成“一纸空文”，除了惩罚当事人，是否还应有人承担责任？

个别名人无视法纪不足为奇，重要的是，绝不能让所谓的特权击碎政府公信。近年来，个别部门在执法中的不公处置、差别对待，频频刺痛百姓神经。当城管一边对拆除某些违章建筑拖延迟缓，一边却对清扫路边摊贩雷厉风行，当计生部门一边对名人超生麻木迟钝，一边却对普通超生家庭手段强硬，不同身份、不同地位而遭遇的迥异境遇，不仅损伤了社会公平，更伤害了宝贵的法纪权威。

“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”没有任何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，没有任何人能拥有法律以外的特权。由此观之，张艺谋超生事件并非可以轻轻放过的小事。谚语有云，“法律如果推不开特权的门，也一定跨不进人民的心”。无论是维护政府公信，还是维护执法权威，有关部门都应当真正承担起应有的责任，拿出该有的态度和决心，给社会一个清晰的回答。（2013年12月2日《新华网·时评》姜琳）

# 用“财产公开”阻击“带病提拔”

近来，有关“新提任官员财产公开”的话题成了社会热点之一。

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提出，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。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日前刊文称：要着力健全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制度，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、财产、出国（境）等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，建立健全对国家工作人员配偶子女移居国（境）外的管理制度。从中纪委此文看，十八届三中全会“新提任官员财产公开”的改革要求将会逐渐落地。

“新提任官员财产公开”对“带病提拔”现象将是一种有效的阻击。“带病提拔”，是指干部在提拔前或提拔过程中就存在违纪违法行为，但未能发现，仍然加以提拔和重用。“带病提拔”现象有多种原因，比如用人制度执行不到位，考察不深不细，贪官隐蔽性较强，等等。还有个直接原因是，在某些小环境中，有些人往往因“病”更容易胜出。他们想方设法捞钱，再用钱去拉关系，提拔之后再捞更多钱。比如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党委委员林伟忠，竟拥有过百套大面积高档房产。他在当镇国土城建办主任时就向工程施工队索贿，然后花大笔赃款跑官买官，权大了搞钱也越来越凶，结果是“带病的更好提拔”。如果说“带病提拔”是污染了水流，那么“带病的更好提拔”则污染了水源，更可怕。因此有权威媒体呼吁：谨防“带病的更好提拔”。

杜绝“带病的更好提拔”需要做很多事，最有力的举措便是“新提任官员财产公开”。现在的干部工作领域、生活和活动范围愈来愈宽，给干部考察带来了一定难度。一些地方对干部的考察方法比较简单、范围狭小、力量薄弱、时间短促，很难准确发现干部存在的深层次问题，难以掌握到真实情况。多双眼睛就多道监督，财产公开，有利于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选择权和监督权，落实群众公认原则，进而促进官场生态风清气正。

事实上，《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》前几年已经实施，申报范围涵盖了官员全部财产和家庭情况。这些年来，包括南京江宁在内的不少地方已先后进行官员财产公开的尝试。但就总体成效而言，与公众期待还有很大距离。实践已启示我们，推进官员财产公开也不能指望一步到位，而应找准突破口，步步深入，让制度真正运转起来，“新提任官员财产公开”就是个好切口。因其“新”，推进阻力小，也容易有实效。

反观有些地方官员财产申报之所以“虎头蛇尾”，主要在于核查不力，对不如实申报者惩处也不力。确保“新提任官员财产公开”发挥应有效用，就要在严格核实上下真功夫，在查处不如实申报方面出实招。由“新提任官员财产公开”切入，执行制度不打折扣，定能做好官员财产公开这篇大文章。（2013年12月4日《南京日报》刘根生）

◆纵 横

# 《自然》杂志登影评

影评与科学期刊，两者似乎八竿子打不到一起。不久前，国际权威学术杂志《自然》却登了一篇近期热映的太空题材电影影评。不长的文字中，没有太多关于航天技术、物理原理的深奥术语，而是循着电影的脉络，将现实世界航天员“尽往坏处想”的准备法则娓娓道来。

有人诧异，如此“娱乐化”，会否有失其作为顶尖学术期刊的“派头”？其实，传递高水平的学术研究，寻找科学与社会热点的交汇点，启迪思想，都是科学传播过程中重要的事情。正如复旦大学教授李辉所言，科学的呈现方式多样，没必要“面目可憎，血淋淋的”。

同样是享有盛誉的《科学》杂志，专设“未来”栏目，发文基于科学精神，并尽情畅想未来，其中作品多次获得科幻小说奖项。还有一些优秀期刊的特约撰稿人，将前沿领域研究成果，翻译为更轻松易懂的文字，面向更多读者。这些读者中，既有其他专业领域的科学家，在触类旁通之中或许灵感泉涌，也可能有普通人，就此燃起对科学的浓厚兴趣。

常有人感叹，如今国内科普作品少，科普力量弱，科普效果有时也难尽如人意。何不从打破原有观念、创新机制做起，让学术期刊、科研人员、媒体等更多力量积极参与进来，以最新的理念、最前沿的科技进展为大众展示科学之美？

2005年起，上海市科技奖项中就已专设科普类奖；去年起，更是首次将评审范围从单一的科普著作，扩大到科普作品、展品和人才，这包含着对加强科学传播的期许。我们期待，让科学成为最“酷”的事。（2013年12月04日《解放日报》彭德倩）

◆史海钩沉

# 1978年谷牧率团出访西欧 助推改革开放

1978年5月初，谷牧副总理率领一个庞大的中国对外经济考察团，飞向了西欧。这个考察团，由谷牧亲任团长，由轻工部杨波、水电部钱正英、农业部张根生、计委王全国、北京市的叶林等诸多部长，还有李灏、胡光宝等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，一行30余人，可谓阵容齐整。这样规模的经济考察代表团，大张旗鼓去西方考察经济，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史上还是第一次。

第一次出访西欧，即使是中央政府的官员亦不免出洋相。有一位不敢吃冰淇淋，大家问他为什么，他说他怕冷。“那你可以把它加热了再吃嘛！”回忆那段往事，83岁的李灏讲着讲着，自己先笑开了。虽然是第一个高规格代表团，但毕竟大家是第一次去外国。

访问的第一站是法国。谷牧当年的警卫员袁增春回忆说：“前一年法国总理巴尔访华，邀请华国锋总理回访，因为华国锋刚刚当上总理比较忙，就定下让谷牧代表中国出访。巴尔当时表态说，谷牧是代表总理来的，要按照总理的标准接待。巴尔亲自到机场去接，晚上宴请大家。按惯例，宴请时警卫员是不上桌的，但这次却是破了例。”中国派出的是高规格的代表团，当时接待的规格不是对等而是更高。

高规格接待，意味着对中国超乎寻常的兴趣。谷牧与法国总理巴尔会谈，按议程第一项应是谈政治问题，结果，巴尔上来直接省略了这一节：这些问题您同总统会见时再讨论，我们今天主要谈经济。1977年法中贸易额为什么下降，这同两国的友好关系不相称。等到谷牧去与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见时，总统一上来亦先解释说他对经济更有兴趣：法国的东西哪些是中国需要的，法中两国可以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发展合作？

那一时刻，西欧诸国对中国最浓厚的兴趣所在是：经济与贸易。

代表团回国的第一站是新疆乌鲁木齐，上午到，下午大家就开会讨论如何形成向中央汇报的报告。第二天，李灏和王全国等人就开始写报告的初稿。欧洲对中国的兴趣，当然是重点之一：目前西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，经济上处于萧条时期，产品、技术、资本都过剩，急于找出路。显然，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时刻重要的国际背景。

如果从外部——欧洲各国的兴趣实质，转向代表团内部，他们对欧洲的感觉，深刻的刺激是真实的体验。虽然时隔多年，当年代表团成员杨波回忆那次出访，仍能清晰地报出一连串数据：联邦德国莱茵—威斯特伐利亚电力公司的一个露天煤矿，年产煤5000万吨，只有2000名职工；而国内，产5000万吨煤需要8万人。法国马赛的索尔梅尔钢铁厂年产品350万吨，职工7000人；而武汉钢铁公司年产230万吨，有6.7万人。欧洲以及资本主义国家，远非我们国内自己所描述的那般黑暗。

震惊之下，代表团成员不免疑惑：为什么我们会对别国有那样不真实的想象呢？李灏问当时中国使馆的外交官：“你们为什么不把真实情况报告给国内？”他得到的答案明确而无奈：“我们敢讲吗？”

那么，这份向中央汇报的报告如何写？如何描述他们的所见所闻？虽然现在看起来已经平常无比，但在那个时刻，李灏还是用了“石破天惊”来形容这份报告。报告描述说：“应当看到，我们现在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，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，差距还很大，大体上落后20年，从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，差距就更大。”

谷牧所率代表团访欧前后，中国也有部长级代表团分别访问了港澳地区与日本，但是，这种专项性的访问与综合性的欧洲访问，不在同一平面。访问回来的6月下旬，谷牧向党中央、国务院汇报，这次汇报会从15点30分，一直开到晚上23点。在新的认识框架下，谷牧展开自己和代表团对世界与中国的认识，得到了与会者的充分响应，聂荣臻元帅表态很坚决：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，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。谷牧这次调查比较全面，应当拍板了！不要光议论了！

汇报会后，当年7月国务院召开有关部委负责干部参加的务虚会，中央领导指示谷牧去报告考察情况，“要敞开思想来讲”。这显然是一次重要的社会动员过程。从考察回来的汇报，到国务院务虚会，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，对世界与中国新的观察、新的思想在诞生，在扩展。

这次经济考察活动，从5月1日进行到6月上旬，先后考察了西欧五六个国家，一路考察，一路议论，学其所长，避其所短，开拓了视野，增长了见识，活跃了思想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紧迫感更加直观、更加强烈了。

国务院特区办副主任，当时谷牧的秘书胡光宝谈起这一次考察活动时，深有感触地说：这次出访，为后来紧抓不舍的“一个中心，两个基本点”打开了思路，为创办经济特区以至沿海地区对外开放，提供了不少可借鉴的东西。（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第43期李鸿谷吴丽玮）

◆晒评论

▲“当改革号角吹响，中国的节俭风气也在深入渗透”。最近，一些国际观察家有此感言。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，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就公布施行，沿着制度化轨道，节俭之风愈发强劲。这也带来了新的思考：改革越是深化，保持艰苦奋斗、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，为何越显得重要？

一些党员干部沉溺于个人享受，房子不厌其宽敞，车子不厌其豪华，菜肴不厌其精美。然而，觥筹交错之际，催生了多少醉生梦死之徒？声色犬马之中，潜伏着多少欲壑难填之官？挥霍无度之举，又导致了多少离心离德之果？《左传》曰“侈，恶之大也”，白居易言“奢者狼藉”，对党员干部来说，奢靡享乐之害，常在于消磨改革斗志、消解改革共识，助长因循苟且、庸懒散混等坏风气。这正是改革向前进必须排除的阻碍。——《节俭也是一种改革气质》2013年12月5日《人民日报》詹勇

▲据12月4日《法治周末》报道：近十年来，国家多个部委已经陆续甚至数次被单位或个人推上被告席。但每当类似案件发生，案情进展依然会强烈地吸引着公众的眼球。当国家部委站上被告席，法院的压力也不小，近几年，国家部委败诉案件多与信息公开问题密切相关。有数据显示，国家部委涉诉的行政案件败诉率在不断下降。其中，财政部7年中3次败诉。

一位普通律师或是普通市民，不仅能把部委送到被告席上，还能够顺利告赢。这体现了法治社会进步，体现了公权力受到有效制约的事实，因此，对部委来说，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。同时也说明：一方面，约束政府公共权力的法律越来越多。另一方面，“现代公民”正在成长。百姓的法律意识、维权意识越来越强。只有“现代公民”越来越多，公权力才能受到更好的监督和约束，社会才会变得更美好。每一起“民告官”案件，都在见证着社会的改良与进步。——《“部委败诉”见证了社会进步》2013年12月5日《新华每日电讯》王传涛

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：“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。”从“政府管理”发展到“政府治理”，是政府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，也是世界许多国家政府改革的一种发展趋势。

一是总体实现多主体治理的创新。一个突出转变就是，在许多领域由政府单一主体向政府与社会、企业、人民群众多主体转变，实现多主体合作治理。二是加快多个领域管理方式的创新。三是抓好治理过程的创新。按照政府公共政策涉及的不同地域范围、不同层次、不同群体来具体设计互动协商的环节与程序，实现在不同公共事务领域多方主体合作治理的目标。总之，通过多层面、多维度的治理方式创新，推动行政管理体制重点领域的突破性进展，才能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合力。——《有效的政府治理关键在方式创新》2013年12月5日《光明日报》孙彩红

▲最近，河南省纪委推出廉政公益广告《回家吃饭好》，以温馨的画面、质朴的语言向官员们发出了“回家吃饭”的声声呼唤：“回家吃饭好——孩子功课能辅导、夫妻恩爱乐陶陶、腾出时间勤思考、饭菜可口油腻少。”按理说，官员是否回家吃饭是生活“小事”，本不值得如此苦心催促。可在现实生活中，一些干部除了必要的公务活动外，也经常在外吃喝应酬，很少有时间回家吃饭。虽不能简单武断地说“不回家吃饭就是腐败”，但“千里之堤，溃于蚁穴”，不少腐败分子的变质却始于饕餮盛宴上的推杯换盏，许多见不得人的交易都靠吃喝来牵线。

呼唤“官员回家吃饭”，把个别官员从没完没了的酒桌上拉回来，是落实中央“八项规定”、坚决反对“四风”的具体体现。当然，要想从根本上消除“舌尖上的腐败”和“餐桌上的交易”，不仅要喊官员们多回家吃饭，还要从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入手，综合运用行政、纪律和法律的手段，真正把权力关进“笼子”，进一步压缩“权力寻租”的空间和机会。——《“官员回家吃饭”并非小事》2013年12月6日《经济日报》邢志坚

◆文 坛

# “毁人不倦”的批评家

如果在当下中国文坛，有哪位批评家被人称之为“毁人不倦”的家伙，会招来什么样的后果呢？

我能想象到的是：大概被他批评过的作家，轻则在公众场合相遇时会向他翻白眼，重则在背后吐唾沫、谩骂，当然也可能把他告到法庭上去，也曾有过拳脚相加的个别案例。首先，鉴于某些作家长期养成的心理习惯，被批评者也可能将他“居心不良”的批评行为告到主管部门去。其次，他的“毁”人行为，也可能招致同行的鄙视和疏离，害怕与其为伍；同时，这样的批评家如果没有“两间余一卒，荷戟独彷徨”的甘于孤独的精神和胆魄，大概偶尔“毁人”一两次，也就赶紧“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”，与作家和批评家同行共谱“和谐”曲了。

因此，恕我直言，“毁人不倦”的批评家，在当下中国文坛恐怕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。因为这太有悖于中国做人的常理常情了。我们这里通常描述批评家和作家的关系是“同一战壕里的战友”，既是“战友”，岂可“毁人”还“不倦”？

也因此，当我看到某篇文章介绍德国享有世界声誉的批评家马塞尔·赖希—拉尼茨基，其一生批评的座右铭是“能够毁掉作家的人，才能做批评家”时，脑门就“轰”地一声：惊诧、意外、震动！更过分的是，他还认为，批评家的一项天职，是给作家“颁发死亡证书”。拉尼茨基既然以“毁人不倦”为座右铭，那么他的一生究竟“毁”掉了多少作家呢？未见更多资料介绍，我想找他的批评著作来读，目前也找不到汉译本。只有找到一些零星的介绍资料。他自己写的回忆录《我的一生》也已经早就脱销。从不多的介绍文字可以了解到，拉氏的批评文字确实犀利、及物、毫无顾忌。同为批评家的约翰姆·凯泽称他是“最令人生畏，最引人注目，所以也最招人恨的文学批评家”。他在批评作家瓦尔泽小说《爱的彼岸》时，直言这本书尚在“文学的彼岸”，“为他好，同时也为了我们自己，希望这本书尽早被人遗忘”；他在评论格拉斯的《说来话长》时，刚说完某个段落写得尚好后，就不无刻薄地讥刺“这本781页的书，就这5页拿得出手”。格拉斯何许人也？199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啊。在格拉斯获得诺奖时，拉尼茨基在表示祝贺后说：“即使这个奖对格拉斯是合适的，我们也不应该隐瞒，他主要是以早期的作品和一些中期的作品获得该奖的。他最近的几本书，让我和更多的人失望。”

因为“毁人不倦”，拉尼茨基招来被批评者的厌恨是必然的。他在给作家“颁发死亡证书”时，也有作家希望早日参加他的“葬礼”。有一位作家，在对他的批评厌恨至极后，居然以他为原型写了一部小说《批评家之死》来诅咒他。此事在德国学界和读者中曾引发轩然大波。

拉氏虽以“毁人不倦”为天职，但有些作家并未因为他的“打击”而毁灭，反倒在刺耳声中，变得更强大、更优秀。甚至有作家声称：“他批评我，所以我存在。”拉尼茨基于2013年9月18日辞世，享年93岁。他的“死亡”也并非因那部小说《批评家之死》，而属于寿终正寝。德国联邦总统以及数百名德国政要和名流参加了他的葬礼，最有影响力的媒体称誉他为“德国文学批评巨星”。由此，我思索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究竟该如何定位：是“战友”？是“恋人”？是“同志加兄弟”？是“天敌”？或许各种不同的说法，都可以找到所谓“学理”来支撑。我倒更愿意把批评家比喻为鲶鱼，因为它的凶猛，而使船舱水中的沙丁鱼不敢懈惰，它们必须拼命地挥发全部体能不停地躲避鲶鱼的攻击，因此反而变得更壮硕、更灵动、生命力更加勃发，因而也就活得更长久。

马塞尔·赖希—拉尼茨基——难道不是一条充满攻击性的鲶鱼？“沙丁鱼”该感谢“鲶鱼”，还是诅咒“鲶鱼”？当代中国文坛是不是该多些“鲶鱼”？文学会因此变得更好些，还是更差？恭请懂文学和批评的人士来回答。（2013年11月20日《中华读书报》陈歆耕）

社址：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邮政编码：100091 社长兼总编辑：谢春涛 常务副总编辑：钟国兴 广告部电话：62805980 62806380 发行部电话：62806227 兼传真 总编室电话：62805368 62806234 电子信箱：xuexishibao@126.com
定价：全年180元 邮发代号：1—267 国外发行代号：W3970 开户银行：建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户名：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账号：261300045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：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 承印：人民日报社印刷厂